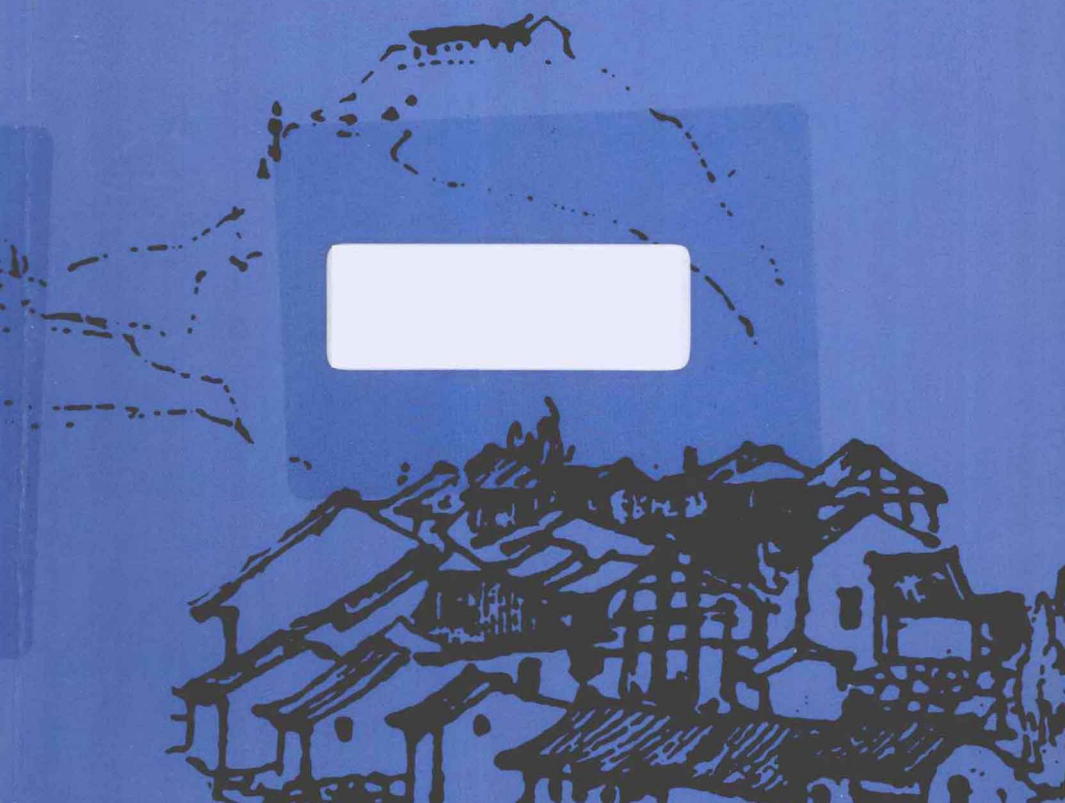


追梦的山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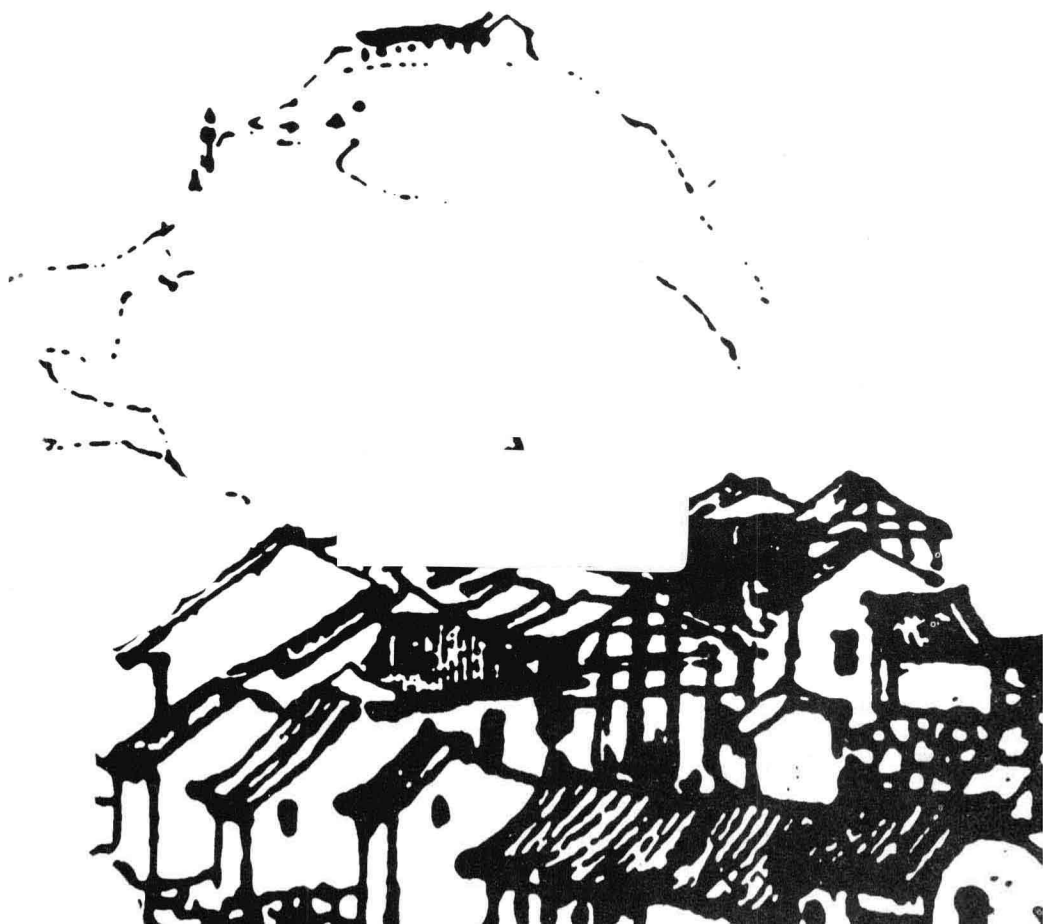
蓝芒◎著



追梦的山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蓝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梦的山谷 / 蓝芒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22-11198-1

I. ①追… II. ①蓝… III. ①文学评论 - 中国 - 文集
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2496 号

责任编辑 闵艳平 乔月娟
责任校对 乔月娟
装帧设计 汪 涛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追梦的山谷
作 者 蓝 芒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亚明星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198-1
定 价 30.00 元

凤凰城感怀 ——代自序

—

凤凰今日始亲游，
为寻《边城》乌篷舟。
最是多情湘西雨，
烟笼苗家吊脚楼。

二

沈老旧居凤城西，
九曲街巷认依稀。
凄凄楚楚文章路，
攘攘熙熙名人居。

三

沈宅浑似附龙楼，
收名“熟客”技一流。
而今墓地平树草，
钧誉之事何时休？

目 录

文 论

文学批评必须守望文学 / 2

文学呼唤激情和想象力

——读白桦新作《蓝铃姑娘》小说二题 / 11

文学批评的真正“缺席”和“失语” / 18

苏策的小说精神

——读《苏策小说精选》兼贺

老红军作家苏策 90 寿辰 / 34

让人性的天空放晴

——读邵瑞义长篇新作《双秀》 / 42

文学应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

——读长篇小说《堍老板》 / 48

“历史的背面”也有路？

——读长篇小说《花腔》随想 / 51

人文精神的最佳典藏 / 56

旅游散文中的人文启示 / 60

洒脱地检阅悲愁

——读黎虹散文集《苔痕藓迹》 / 65

心中自有永恒的阳光

——读汪明传散文集《触摸彩虹》 / 67

因清淡而生香

——读高春林乡土小说《野菜淡淡香》 / 71

对蓝天和白云的礼赞 / 81

让激情在展现历史画卷中燃烧

——读杨曼霞女士《迷茫岁月》 / 84

散文的精神追求 / 89

路问黄花人未老 / 93

从钱关明得到的启示

——序长篇小说《漩流》 / 98

《茶》——香格里拉的记忆

——序长篇小说《茶》 / 103

从平凡中凸显亮点

——序《平凡人的故事》 / 108

敝帚自珍

——中、短篇小说集《没有邻居的人》自序 / 111

珍惜“公共之宝”

——《郇雅公主》自序 / 115

为不真的时代存真

——序董克让先生《存真集》 / 117

聚活，人生的逗号

——序长篇小说《聚活》 / 122

空山风月

——序文集《宝秀十二营盘》 / 125

探源索流 彰显美俗

——序《中国民俗探略》 / 129

穿绿军装的野玫瑰

——诗集《野玫瑰》序 / 132

散 文

追梦的山谷 / 136

刻骨铭心蒙自绿 / 151

去白路乡听歌 / 158

寻香白鱼口 / 162

久久未能飘散的明宫风云 / 169

像梦一样甜美 / 183

砂捞越手记之二：兴都教的节日 / 187

砂捞越手记之三：在外国找后门 / 203

个旧“文学林”记 / 214

文 论

文学批评必须守望文学

迄今为止，文艺理论家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批评多年以来文学批评总是临场“缺席”或临场“失语”的现象。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当问题更有所恶化的时候，有的批评家虽然表面看来仍在对当下的创作进行批评，而实际上他们中有的早成了当下文学创作的“挟洋”和“迷外”的跟班扈从，对形形色色的不良创作倾向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毫无批评的意愿和主见；有的则走得更远，貌似在批评本土文学，实则心有旁骛，只不过仍在拿中国当下的创作说事罢了。

中国文学创作仿佛成了一处无人看守的道口，人流失控，良莠杂呈。

为此，文艺理论家们呼吁，文学批评应尽快摆脱这种随波逐流和目无定珠，或要么“缺席”要么“失语”的尴尬，回到自己的基本盘上来，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

文艺评论家们的忧虑和呼吁无疑是及时的、正确的。但文学批评之所以会陷进随波逐流和目无定珠的尴尬，“缺席”和“失语”仅为其表，即使再加上创作日益商品化、娱乐化、欲望化又让它受到外感风寒，也仍然不是使文学批评忘了本土，失去主宰的真正症结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早已为我们记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并且

也曾再三告诫和提醒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文学批评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没有自己的评判原则和是非标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用外国的标准来要求和评判中国文学；世界上许多东西都在讲“国际化”，唯独文学不能“国际化”；“国际化”只可能带给文学一种结果，那就是崇洋和无可救药的混乱。那种所谓“多元发展”的说法，只不过是混乱的掩饰和无奈而已。而文学批评，它必须保持高昂的批评意愿、自身的明确的批评原则和方向，以及适当的价值尺度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力，绝不可以将文学批评当成外国文学或文艺理论的扈从和丫环，甚或当做专放流行音乐的随身听和只会在农村草台班子上玩板凳龙的角色。而当下关于中西文学“兼容”、“共存”的提法，就恰恰在有意无意的把文学批评变成了这样的小角色！问题很明显，在缺乏评判与筛选的主心骨和主体文本的情况下来谈“兼容”、“共存”，必将消解本土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和查验意识。而且，人家到我们这里来可以得到“兼容”、“共存”，而他们让中国的作品去“兼容”、“共存”了吗？国际上是对等的，不对等就成了一厢情愿。这样做，相当不值！这会形同自毁自尊，自我矮化！本土的文学批评家们也就只好还像前些年那样对这个流那个派做点梳理、归纳和复述的下手活计了，再也不会安心于分析本土的文学文本、研究本土作家、观照本土文情和看守本土文学创作的道口了。一个文苑，真是搞得洋不洋，土不土，奇装怪服，不尴不尬，不干不净。

就差现在再也没有鲁迅先生来给那些批评家从背后“击一猛掌”了。这未免令人遗憾！不过，仍然可以听他一句劝的：“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样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

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是要相反的。”^①

200多年前，张之洞为了向西方借鉴和学习，也曾提出过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理论。暂且勿论他的目的，是为了竭力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而逼不得已借洋输血。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尽管当时朝野上下仍然抖索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张之洞仍然异常清醒而明确：文化引进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为主体，西学只能作为借鉴和补充，而且目的在于为我所用；主就是主，从就是从，不可混淆。而“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提法则几乎不讲主从，不加选择；似乎意味着只要西方的东西能来，来多少算多少，有多少要多少。这样下去，还是借鉴和学习吗？还有主从吗，还分得出甲方和乙方吗？难道就这样让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像乞丐一般去与全球对接？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文明和学术发展的动力，而包容和尊重差异则作为它的主要策略被反复运用。然而，包容和尊重并不是不加比较和选择的，它必须有一个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吸纳标准和筛选过程，这对文学特别对文学批评而言尤其如此。“批评”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判断者”。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应聚精会神地观察判断那些被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产品，对本土和本民族文学艺术的影响及其将要导致的后果进行评估，并指出它由此而呈现的主要现象和可能提供的文学经验；文学批评不但要负起导引读者的审美情趣，提升读者的阅读品味，还必须善于见贤思齐，拨正偏差，引领文学风尚。

^①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44页。

在文学艺术上，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也不可能无目的的。对待“包容多样，尊重差别”的提法也同样如此。我们所要做的仍然是借鉴和学习；仍然是“为我所用”的与国际的对接工程。而不是见了洋的，就以为都是国际水平的，都是先进的和好的了，以为自己的就都是陈旧的，落后的了。毋庸置疑，过去由于人为原因，是曾使中国历史上造成某些置后和倒退。但至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要大家和你一起重唱“外国月亮比中国好”这首老掉牙的歌了吧。也就是说，要将引进的“多样”化变成自己的多样来包容，要将西方的“差别”变成有中国特点的差别来加以尊重，而不是把人家的全部“多样”和“差别”都搬进来“包容”和“尊重”。要是果真那样，也许就不是包容和尊重，而是膜拜了！也许是我多虑了，如此简单的问题，何须我在此絮叨！但话不挑不明：现实中确有一些批评家对评论自己的东西不感兴趣，倒对历数西方共有多少文学批评的种类和品目显得兴致勃勃。凑巧，这里就有一份关于国外文学批评的“丰盛菜单”。上面说西方不但文学创作够份，在文学批评上也品目繁多，花色纷呈：有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有以社会学和历史学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有从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有在人类学基础上和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神话批评和形式批评；有在文体学基础上和接受反应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和接受学批评；还有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文化和比较文学批评；更有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等等，可谓不殫其繁，如数家珍。上文所说文学批评家心有旁骛，此亦其例之一欤？只是我们尚不清楚：批评家这样做是要把所有菜色品目当成自己的“多样”和“差别”加以包容和尊重呢，还是仅仅为了

享受一下罗列的快乐？关于这点，因未见说明，不便猜测。不过，我倒突然想起一件“海外趣事”：据说当我们一些可敬的海归派仍在海外时，常常一边啜饮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却想着怎样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不再被人摆布的强国！不知我们的批评家是否也可以像可敬的海归派那样，在享受罗列的快乐时，也开列几条西方批评家如何坚持不懈地守望各自国家文学的事例，以资借鉴？

说到守望文学，我要不客气地说，我国早在魏晋时期，当西方社会尚在一片混沌之际，中国就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始，有了成形的文艺理论，就曾对当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文学风气和具体文本及其作者进行了精当的剖析评判，成为有史以来对文学进行时的状况进行忠实守望的典范。在曹丕等经典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之后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络绎其后的袁宏道、刘熙载、陆时雍、李渔等等，由这些古典文学批评家所共同建构的中国文学守望者的传统，千百年来薪火相传，从未间断；难道从鲁迅、郑振铎、茅盾、冯雪峰、何其芳、何直等等现当代的文论家、批评家的身上就找不出一点什么“审美批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批评”的学术意涵吗？其实并非找不出，只是总感到“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好”罢了。然而，从中国的古代到现当代，从中国的曹丕、刘勰，到中国的鲁迅、何其芳，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早已为中国的文学批评造就并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曾影响造就并且继续在影响和造就着一代代中国作家，催生着一部部杰作……我这样说，绝不是为了炫耀历史，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仅仅是为了提个醒：进行交流和借鉴是必要的，但在罗列西方文学批评的繁荣和精彩时，切勿

妄自菲薄，切勿丧失自重和自尊！

历史常向我们提示：国运昌盛，往往都紧随着文学繁荣；唐、宋、元、明，诗、词、曲、话，事例多多。但为什么在当下，在国家经济和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在日新月异之际，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状况却是另一番情景？从什么时候起它变得如此地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繁荣不适应、不相称？不错，恩格斯是曾指出过，文艺对经济的反应不是对应的、成比例的反应，而常常是“头足倒置”的反应。可是，我们的“头足倒置”快30年了，也该修成“正果”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理当充满尊严和底气地站到自己的评判岗位上，用自己的理论去评判当下本土的文学状况，评判本土作家和作品了！这里多么需要有一位像灯塔守望者那样忠诚执著的文学守望者啊！

就在20世纪，在中国文学17年时期，就曾有过这样一批优秀的文学守望者，他们中有两位更特别值得我们尊敬，他们就是何直先生和邵荃麟先生。时当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创作界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脱离生活、粉饰现实的理论影响，那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窄”，无处没有“堵车”现象：跌落到严重的公式化、雷同化的泥沼之中；许多作品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作家们也似乎“深陷”思想僵化、想象力枯竭、“江郎才尽”的困境。一到构思情节和设置人物时，总是一边是浮躁冒进的社长，一边是具有坚强党性和把握正确路线的书记……为了化解这种千人一面、千面一腔的创作困境，创作界和理论界都苦心焦虑，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在这时，作为作家、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何直先生敏锐地、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创作上公式

化、概念化的原因是教条主义，要想避免它，作家们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并且要扩大现实主义的创造性范围，更深入一步去了解现实主义的特点，自觉地干预当前的生活，为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的作家们从十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①

无疑，这是创作界的知心人和一个忠实的文学守望者发出的最及时、最具震撼力的提醒、启示和呼号！随后便陆续产生了一批如像《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家信》、《田野落霞》等预示着中国文学有可能绕开那道图解政策的、“为中心服务”的死胡同、漫步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上。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何况创作界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时，便有人急忙出来将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说成是“揭露阴暗面”的“大毒草”！结果文学创作又被迫走进烦恼的无所适从之中，直到文学的画廊上又重新出现了一批如像范登高、赵满屯、小腿疼、吃不饱、老牛筋、梁三老汉等有着强烈现实魅力的新脸孔以后，才又依稀显现出一个“柳暗花明”的轮廓。而中国文学的另一位忠实的守望者邵荃麟先生同样是在这紧要时刻站了出来，明确地指出：创作上范登高、吃不饱等人物形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是文学冲破“工具论的低俗藩篱，重新回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本质的表现”，是“现实主义的”又一次深化。他提出作家们可以“写

^①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中间人物”，因为这些“芸芸众生”可以“使文学面对生活，深入地反映现实矛盾”。邵先生认为：

……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①

但也许这些“中间人物”出来太迟了，也许恰好相反，他们都未免过于“早产”了！总之还是生不逢时！果不其然，蓦然间又因天空中阴云密布，风诡雨骤，“中间人物论”便和《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起成了“黑八论”！于是，“芸芸众生”便刹那间变成纸人纸马，纷纷落地！中国文学再次走进一条真正阴冷的死胡同。

我想，我们不必也没必要在这里重提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同样，我们也不必和不需要再去掂量和论证何直和邵荃麟两位先生的论述是否真正具有或已达到时代高度，是否真正引领文学走出了困境，并为文艺开拓出了一个真正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因为这对一个身处其境的具体人物而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超时空要求，显然荒诞不经！何、邵两位先生之所以值得我们忆念尊敬，是因为他们两位在当时极其室闷和严酷的氛围下，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文学运动的现实状况，坚持不懈地观察它的发展前景和所患症状，朝夕为其诊病把脉，悉心开具良方。尽管何、邵两先生最终未能将文学创作引领到一个宽松开阔的天地，免除被室闷和被绞杀的命运。但

① 引自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发言。

他们作为文艺批评家的确在用满腔热血、毕生精力、满怀关爱地守望着文学，直到自己也像那些满地的赵满屯、吃不饱等等纸人纸马一样，砰然栽倒在地。他们无愧于批评家的称号！要是拿他们来相比于当下，相比于在文学批评面对商业化、娱乐化、欲望化的写作而束手无策的文论家们，面对思想境界和文学精神双双堕落，而显得麻木不仁的批评家们，不是显得我们太愧对前辈，太失职了吗！事实已经一再告诫过我们：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不是时时刻刻聚精会神追踪创作的演变，深切剖析原创文本，对文学运动的方向实质随时有大思考、大把握；能够随时警示偏差、拨正航向，给予文学创作及时的、强大的理论思想支持，而一味地随着国际上的什么奖、什么派的风向起舞，是无法指望中国文学能够繁荣昌盛起来的，顶多能摇晃一下所谓“多元发展”的旗号，聊以自我安慰罢了。

文学能否健康繁荣、持续发展，不能没有忠实的守望者。